

繆
钺
著

冰
蘭
盦
叢
稿



C532
1

C53
39

冰茧庵丛稿

缪 钺 著

冰 萤 庵 丛 稿

缪 钺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十二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9 字数 204,000

1985 年 8 月第 1 版 198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 01—5,000

统一书号：10186·494 定价：1.35 元

自序

解放以前，我曾选辑所作论述中国古典诗词之文共十篇，名曰《诗词散论》，付开明书店，于一九四八年刊行；一九八二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时，又增入一篇。六十年代初期，我又选辑了研治魏晋南北朝史之作共十四篇，名曰《读史存稿》，于一九六三年由三联书店出版，近年曾先后在香港、北京两地重印。

除去以上两个论文集所收的二十五篇文章之外，我在各报发表的论述中国古代文学与历史之文尚有数十篇，还有札记若干篇。自从扫除“四凶”，拨乱反正之后，生平知交及出版部门同志都曾劝我再选编一本论文集刊行。因为我解放前发表于各报刊之作，手边多无存本，故迟迟未能从事整理。近来承友人帮助，将我所需要的旧作从各地图书馆中寻觅复制寄来，我于是综合解放前后诸作，选取了二十六篇，内容按哲学、史学、文学分类编次，又附札记七篇，都为一集，名曰《冰茧庵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惠予刊印，于此敬致谢意。

这个《丛稿》中所收录之文，最早的撰写于三十年代初期，最晚的到一九八三年，前后共历五十年，可以看出我治学见解的某些转变。在整理抄录清稿时，除改正错字、略饰辞句之外，内容方面未作修改，保存当年文章的面目。有几篇文章，没有收入。譬如解放前撰写的《吕氏春秋撰著考》、《南北朝之物价》（分别发表于《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六卷、第九卷）两文，还拟多作修改，而我现在视力衰损，难以为力，故暂时不选；又如《丛稿》中已

收入两篇论杜牧之文，所以一九八二年应约所写的《杜牧评传》一文，亦未选入，以免重复。

昔江藩谓刘端临（台拱）“勤于读书，懒于著述。”（《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七）我的学问造诣虽远逊于刘端临，而“勤于读书，懒于著述”这一特点，却与他有相似之处。我平日涉猎群书，时有触悟，或覃思冥索，妙绪往来，常是在札记中疏写大旨，或存储胸中，腾为口说，很少广求论证，深入阐发，写成专篇。所写成专篇者，或供生徒讲授之稿，或与友朋讨论之文，或是应报刊之约，多是有为而作的。《丛稿》所收诸文，内容庞杂，不成系统，此亦一因。还有，我平日行文，习于简约，直谅多闻之友曾对我说：“你写文章，在论证要旨之后，往往适可而止，不肯再做进一步的阐释，虽免支蔓之弊，亦少详尽之功。”这也是我的一个短处。不过，尽管如此，这二十几篇文章，总还是标记着我在数十年治学过程中点点滴滴的雪泥鸿爪，所以过而存之，以就正于读者。

在六十年代初期，我精力未衰，很想就平日研治文史胸中所蓄者，整理爬梳，撰写两三部专著。而十年动乱，劫历沧桑，旧业顿荒，良时虚度。拨乱反正之后，文教昌明，我虽然很想重自振奋，无奈久患目疾，读写艰难，积稿丛残，理董不易，二十年前之夙愿，遂无从实现，言之增慨。不过，我仍然愿意尽炳烛之明，竭驽骀之力，诱掖指导四川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室中的中青年学人，选注《三国志》、编纂《北朝会要》、斟注《魏书》。学问者，天下之公器，不必出于一己，我虽累于目疾，不能多从事于撰写，但是如果看到我所培养的中青年学人，駉駉日上，著述斐然，这岂不是更可庆幸之事吗？

至于我自己呢？既然难以独力胜任巨著，只有就力所能及者略事撰写。最近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叶嘉莹教授合作，共撰《灵溪词说》，就平日读词心得，自创体例，独抒所见，他山攻

错,获益弘多,异日书成,亦庶几迟暮之年,桑榆之获矣。

我在对旧作《丛稿》作《自序》之时,兼述最近治学情况,望海内学者进而教之。

一九八三年四月,缪钺写于四川大学历史系。

目 录

自序	1
论荀学	1
论战国秦汉间新儒家	
——与钱宾四论学往复书札	8
《吕氏春秋》中之音乐理论	22
清谈与魏晋政治	32
陈寿评传	59
南朝农民起义的地区问题	74
关于武则天的评价问题	87
李冶李冶释疑	94
再论皮日休参加黄巢起义军的问题	97
周代之“雅言”	110
曹植与五言诗体	118
《文选》赋笺	
——班固《两都赋》、王粲《登楼赋》	127
颜之推的文学批评与作品	134
蜀中杰出的古典诗人陈子昂	142
曹植杜甫诞生纪念	148
读韩愈《柳子厚墓志铭》	151

杜牧诗简论	157
重印冯集梧《樊川诗集注》前言	167
附：杜牧卒年考	176
欧阳永叔治学之精神	178
欧阳修作文勤于删改	184
关于李清照词	189
《遗山乐府》编年小笺	195
黄仲则逝世百五十周年纪念	219
读郑珍《巢经巢诗》	
——谈五七言诗体的运用问题	223
王静安诗词述评	229
《迦陵论诗丛稿》题记	246
附录(札记七篇)	
谈诗歌中语言艺术的精炼	256
欧阳修的散文	261
也谈“诗中有画”和“画中有诗”	264
意境相通	
——论晏几道《鹧鸪天》词	266
成都设置锦官始于蜀汉	268
杜甫如何改诗	271
关于杜牧《清明》诗的两个问题	274

论 荀 学

荀子之于儒学，在先秦为大宗，在汉后为别派；西汉经学，多传自荀子，而汉后二千年间，国人思想受荀子影响者反甚少。荀学之短长利病及其所以致此之故，亦中国学术史上一问题也，愿得而略论之。

古代儒学，创始于孔子，下至战国秦汉间发展始备，源远流分，流别各殊，举其要者，厥有三派：曰孟子，曰荀子，曰战国、秦、汉间之新儒家（即《易传》、《中庸》、《礼运》诸书之作者，此诸书思想相近，而自有其特色，钱宾四君名之为“战国、秦、汉间之新儒家”，今采用之）。孟子言性善，主扩充；荀子言性恶，主矫正。孟子论性善，推原于恻隐之心，重情感；荀子谓人性虽恶，而卒能弃恶从善者，由于“知善之质”，即今人所谓理智。孟子论政，尚德教，尊先王，寄其理想于远古，言必称尧舜，鄙视春秋战国之政治；荀子论政，重刑赏，法后王，对于当时秦之法治亦颇欣赏。孟子高明，思致宏朗；荀子沈潜，文理密察。此孟、荀之大较也。所谓新儒家者，肇端于战国晚世，而下逮西汉初期，在古代儒学中为最后之一派，融合各家之说，而以受道家与阴阳家影响为大。道家与阴阳家论事理均喜推本天道，故此派儒家好玄眇之思，能予儒家旧说以形而上学之根据，颇有其新贡献，较之孟、荀，虽均不尽同，然论其大体，则近孟而远荀。此派儒家主性善（《周易·系辞》：“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作《中庸》者托为子思之说，而孟子之学亦出于子思。此近于孟之证也。

《周易》本卜筮之书，此派儒家始推尊之，作《系辞》，赋予《周易》以哲学之意义，并谓“探賾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而荀子则不重《周易》，其书中三次以《诗》、《书》、礼、乐、《春秋》并言，未尝视《周易》为同科，《礼记》中之《王制》篇乃荀学之徒所作（此事余别有论证），亦反对卜筮，曰：“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此派儒家喜言天道，论天人之合，而荀子则曰：“唯圣人为不求知天”，又曰：“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此远于荀之证也。

每一学者思想之构成，因素虽多，而其个性亦为重要因素之一。荀子之为人，盖理智发达，注重事实，近于科学而远于玄思，喜逻辑之思辨，乏诗意之想象。（按荀子赵人，赵为三晋之一，晋人勤俭，重实际，长事功，春秋时晋国士大夫多政治军事之才，故晋国霸业最久，荀子盖亦禀晋人特性，与齐鲁儒者稍殊也。）其于孔子之学，取其近于己之天性者而发扬之，而于战国其他儒家之说，则就其远于己之天性者而排抵之，遂自成一家之言，而短长优绌，亦由是而生焉。

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而荀子特重礼，谓学“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又主张“隆礼义而杀《诗》、《书》”，盖礼，大之为国家典章，小之为个人行为之轨范，其仪文节式，见诸实行，皆有定制，非可以玄想空言，且荀子主性恶，化性起伪，端赖于礼，故特重之。此荀学特点之一也。孔子论政，尊德礼而轻政刑，孟子纯本孔子之言，阐扬王道仁政，荀子虽尚德教，而又明法制，执赏罚，主整齐画一。盖孔子论政，乃为春秋之侯国而发，所谓“道千乘之国”，战国世异势殊，纵横数千里之大邦，已具后世帝国之雏形，远非春秋诸侯之可比，治理之法，势必舍旧谋新，于是商鞅、申不害之法治应运而生。荀子深察事实而不徒骛理想，虽主德治之旨，兼采法治之方，其游秦之时，秦相范雎问以对秦

政之意见，荀子虽病其无儒，不合于王者之功名，而亦称赞其人民之朴顺守法，官吏之公忠尽职，谓其“佚而治，约而详，不烦而功”，其弟子韩非、李斯，变本加厉，遂为法家。此荀学特点之二也。孔子主正名，意在施用于政治与人伦，荀子亦主正名，则重在研求知识与论辩事理。战国中叶，惠施、公孙龙等辩者，纯本理智观点解释宇宙事物，其所论虽似违反常识，然推理之方则甚严密。荀子反对辩者学说，谓其“察而不惠，辩而无用”，而于其思辩之逻辑方法，则颇能欣赏而接受之，作《正名》篇，讨论名之问题，主张先定界说，然后积而为“辞”（“辞”殆如今人所谓语句），衍而为“辨说”，凡辨别是非，应穷其所以然之理，所谓“辨则尽故。”荀子自己立说及驳难他人，皆本正名之法，此在《正名》、《性恶》、《正论》诸篇均可征之。荀子论学，善于分析，陈义说理，逐层推进，文章形式，结构紧密（如《正名》、《解蔽》、《性恶》诸篇），盖荀子重理智，故在先秦儒家中为最长于思辨而崇向逻辑者。此荀学特点之三也。吾国初民，信天为人类主宰，可以降祸福，示吉凶。孔子尚理智，重人本，不语神怪，罕言天道，然于古代宗教观念，亦未尝公然抨击。至道家出，始破帝蔑神，视宇宙为自然。荀子承继孔子精神，兼采道家自然气化之说，于宗教之思，迷信之事，扫荡无遗，曾作《天论》篇畅发其旨，谓一切天象变化均与人事无涉，雩祭卜筮，乃君子所以文饰政事，非真有灵验，盖孔子以来儒家崇理智重人事之态度，至荀子而表示者极鲜明矣。道家视天为自然，而其对天之态度则为顺应，荀子极重人，以为人不但当迷信天，亦不当顺应天（故谓“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而当克服而利用之，曾曰：“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近人或据此谓荀子有科学之精神。此荀学特点之四也。总之，荀子之于孔学，乃取其性之所近者发扬光大，而兼受申、商、老、庄、施、龙之影响，遂自具

精神面目矣。

荀子于战国诸儒，如子张氏之儒、子夏氏之儒、子游氏之儒，均有毁辞，而于孟子，排抵尤烈。儒家之学，本重实行，不贵表面之仪容，而贵内在之真性情。若内无诚心，而惟务貌袭，则变为乡愿。战国儒家末流，盖有蹈斯弊者。荀子所讥子张氏之贱儒，“弟佗其冠，神禪其辞，禹行而舜趋，”子夏氏之贱儒，“正其衣冠，齐其颜色，嗛然而终日不言，”殆即斯类。辞而辟之，固甚当矣。而荀子之评孟子，则似未尽公允。荀之与孟，性恶性善，各趋极端，其不相容，固无足怪。至于《非十二子》篇讥子思、孟子“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又讥其“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则不无可议者。孟子尽性知天及万物皆备于我诸言，自荀子观之，固可谓其“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而孟子书中自述其学及称道子思，均无五行之说，荀子何故以此加之？盖上文所述战国晚世之新儒，虽采道家与阴阳家之说，而亦与孟子相近，或附其新说于子思、孟子，其中殆有五行之言，荀子《非十二子》篇中明言：“子思唱之，孟子和之，世俗之沟犹贅儒嚙嚙然不知其非也，遂受而传之。”荀子以为此派新儒家尽承思、孟之说，实则此派新儒上附其说于思、孟，荀子所讥，思、孟本人不尽受也。夫孟子书中，如尽性知天、万物皆备于我诸论，正见其思致高明，至于战国晚世新儒，其得自阴阳家者，固无足道，而其得自道家者，能在儒说中创立形而上学之新哲学，絜静精微，卓有光彩，荀子反对五行之说，固见其崇尚理智之态度，而因乏玄眇之思，遂于孟子及此派新儒之哲学思想，亦不能欣赏，而讥之为“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此则荀子之蔽矣。

荀子之学，虽修短互见，然切实渊博，精熟周代典籍及制度，于诸家之说，详知细察，评判深刻，不愧为战国末年儒家大师。《荀子·尧问》篇曰：“今之学者，得孙卿之遗言馀教，足以为天下

法式表仪，所存者神，所过者化，观其善行，孔子弗过。”此盖秦、汉间儒者之言，可见荀子地位之尊。

荀子在先秦儒家中地位虽尊，而自汉以后，则逐渐降落。西汉经学，多传自荀子，汪容甫《荀卿子通论》所言，大体可信。西汉人撰著，如大小戴《礼记》、《韩诗外传》、《史记》等，多采荀子之文，大儒董仲舒、刘向均称美荀子，在西汉时，荀子地位似尚在孟子之上。唐韩退之特尊孟子，谓其醇乎醇，而以荀子下比扬雄，谓其大醇小疵，荀子已降于孟子之下。宋儒程、朱等扬孟抑荀，以孟子上跻《论语》，而称“荀子极偏驳，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程明道语），又谓“荀卿全是申、韩，他那做处粗”（朱晦庵语）。于是荀子由儒家大师而沦为异端杂学，几与杨、墨、申、韩为伍矣。清乾嘉学者，如钱竹汀、戴东原、汪容甫、郝兰皋等，渐表彰荀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论荀子亦为平反之词，可以代表当时汉学家之意见，而清末学者倡大同之旨，扬民贵之义，又多贬斥荀子。汉后二千年中，荀子在学术史上之地位如此。

荀子既为战国晚世儒家大师，西汉经学又多荀子所传，何以二千年来荀子地位逐渐降落，荀学亦不能如《孟子》、《易系》、《中庸》诸书影响之大，其故亦可得而论。西汉儒者虽似尊荀，而当时人思想则受阴阳家沾溉者为深。天人灾异之说，五行休咎之征，附会于《周易》、《春秋》及《尚书·洪范》诸书，风靡一世，董仲舒、京房、刘向为之魁首。董仲舒作书美荀子，而其精神实与荀反，荀子曰：“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不信雩祭之事，而董仲舒之治国，则“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其悬殊有如此者。在阴阳五行机祥征应之思想盛行之际，宜乎荀学真义之不能大彰也。魏、晋至隋唐七百年中，老、庄及佛说大兴，宋儒虽复振儒言，而以染于佛家天人性命玄眇之思，在儒书中求其近似可借以发挥者，故最

尊《易·系》、《中庸》，次则《孟子》，荀子以言性恶及稍向法治与孟子相违，而其书中又乏幽玄之哲思，故不为宋儒所喜。清乾嘉学者治学切实，且反抗宋以来传统之说，始稍稍称道荀子；然钱竹汀、汪容甫、郝兰皋等乃学者而非思想家，仍未能发挥荀学精义，流风所被，仅使其书渐为人所重，校勘脱误，训释辞义，易于研读而已。惟戴东原最好深湛之思，霸才锐气，不主故常，论学重解蔽，尚理智，与荀子相近，故其知荀子较同时诸学者为深，在所著《孟子字义疏证》中曾谓，宋儒所谓气质之性，即荀子性恶之义，宋儒变化气质，即荀子化性起伪之说，故曰：“宋儒之说，似同于孟子而实异，似异于荀子而实同，”此已言人所不敢言矣；又引《荀子·劝学》篇之语而论之曰：“荀子之善言学如是，且所谓通于神明，参于天地者，又知礼义之极致，圣人与天地合，其德在是，圣人复起，岂能易其言哉！”其推崇荀子不可谓不至。然戴东原所以仍未敢大倡荀学者，盖戴氏立论反程、朱，已犯世之大不韪，故附其说于孟子以盖程、朱，如再提倡荀子，必益将惊世骇俗，被斥为异端邪说。故戴东原之智虽足以知荀子，而仍不得不附于孟子者，殆有深意苦心存于其间也。至于晚清人之贬荀子，又别有故。晚清维新之士，思覆清室以建民国，高识者进而寄心大同，因君主专制政体始于秦始皇，秦制乃荀子弟子李斯所定，而孟子书中曾倡民贵君轻之义，故叹息于二千年来荀学盛行，孟义黯晦，仅为小康，未臻大同。此则因时立言，有激而发，未可谓能尽荀学之全也。

总之，二千年来之儒学以汉、宋为盛，荀子重理智，破迷信，而西汉经生受阴阳家影响，喜五行灾变之谈，荀子重实际，尚事功，而宋代儒者受佛学启发，好心性玄眇之说，则宜乎荀学之不遇不合，在儒学演变之过程中，以大宗而降为别派，不能与孟子及《易·系》、《中庸》诸儒抗席矣。往事不论，吾人今日辨章学

术，宜与荀子一新估价也。

（原载《思想与时代》月刊第三十六期，1944 年）

论战国秦汉间新儒家

——与钱宾四论学往复书札

与 钱 宾 四 书

缪 钊

宾四吾兄史席：日前幼伟兄出示尊著《易传与礼记中之宇宙论》，浣诵佩慰。忆去年兄在遵义时，春郊偕游，纵论学术，兄曾谈及，战国晚世下至秦汉间之新儒家，其思想在中国学术史中至为重要，学者所宜究心。惟当时粗引其端，未加阐发，今读尊文，精宏邃辟，辨析入微，千里之遥，如亲譬咳，欣忭何极。吾兄据《易传》、《戴记》阐论战国秦汉间新儒家之宇宙论乃受道家影响，而又弥缝补缀以曲合于儒家传统之人生观，考明学术之流变，抉发古人之深心，所论固精卓不易矣。窃以为犹有一义可以附论者，即此派新儒家所受阴阳家之影响是也。弟尝沈潜反覆于《易传》及《礼运》、《乐记》、《中庸》诸书，深觉此派儒家除受道家影响之外，尚带阴阳家色彩，大抵思致精微，富于想象，取孔、孟以来儒家传统之说，更予以形而上学之根据，此其所长也。而古代天人徵应术数迷信之观念为孔、孟所漠视、荀子所排击者，此派儒者又稍吸取焉，于是儒家澄洁之思想中复略杂入迷信之成分，至西汉而其风大畅，此其弊也。此派儒家多上托于子游、子思、孟子，而深为荀卿所不满，荀卿排抵此派儒家，遂归咎于子思、孟子。弟

之鄙见如是，姑妄论之，以就正于有道。

据《左传》、《国语》所记，西周末至春秋时，虽偶有以“阴阳”解释宇宙现象者，如周之伯阳父、内史叔与越范蠡等，至于特重阴阳，视为宇宙万物变化之两种基本力量，而著书立说持以说明一切天象人事者，盖始于齐之邹衍。故司马迁论述邹衍之学，谓其“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馀万言。”汉人论述先秦学派，称邹衍一派为阴阳家。邹衍，齐人，生于海滨，富幽眇之思，喜荒诞之谈，既深观阴阳消息以为立说之宗，又取古代术数中“五行”之说、天人征应之观念而理论化系统化，创为五德终始之论，其言历史、地理，怪诞新奇，耸动一世，遨游齐、燕，号为显学。《庄》、《老》书中虽亦偶言阴阳，然未尝言五行。庄子掎击皇古以来之宗教观念，而邹衍则吸取之，庄、老之说为自然主义之哲学，视宇宙为自然之气化，与人事无涉，而邹衍则大倡天人相与、机祥征应之论，此道家与阴阳家差别之点，其言阴阳虽同，而其所以言阴阳则异。但邹衍虽倡阴阳五行之说，然亦旁通儒言，言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而邹衍稍后，一部分儒家（尤其齐地之儒家）受此阴阳五行新说之震荡，喜其怪奇玄眇，取以解释儒家旧说，兼融入道家思想，于是《易系辞》、《礼运》、《乐记》、《中庸》诸书出焉。

《周易》本占筮之书，其卦辞、爻辞中虽偶有古人由生活经验所得之格言，而正统之儒家如孔子、孟子、乃至荀子，皆未尝以《周易》与《诗》、《书》、礼、乐并重。吾兄昔日撰著，于此义阐发已详。受阴阳家影响之儒者，在附会阴阳之义于古代典籍中，则莫宜于《周易》，因乾坤二卦即代表阴与阳之义也。但《周易》中虽含有阴阳之义，然《易·系辞》以前之解释《周易》者，未尝特重阴阳。《左传》、《国语》所载，春秋士大夫引《周易》或以《周易》卜筮而解释其义者，亦未尝用阴阳之字面。《彖传》、《象传》中言及阴阳者